

偏旁视角的先秦形声字发展定量研究*

刘志基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上海 200062)

[摘要]立足数字化平台,在完成殷商甲骨文、西周金文、战国楚简帛文和秦简文形声字及其偏旁(声符与义符)的定量调查统计的基础上,通过字头与偏旁数量之比,证明先秦形声字偏旁具有历时发展的精简化趋向;通过声符与义符数量之比揭示了在“标类”与“标声”两大形声字发展途径中,前者始终占据愈益强势的主导地位;通过各类型文字偏旁构频之比,证明了不同类型文字对偏旁各有不同的选择性,这种选择的差异既由文字系统历时发展所促发,也有文献类型差异的成因。

[关键词]先秦 形声字 偏旁 声符 义符

形声字研究,历来是汉字研究的一大热点,既有研究在形声字的成因和产生途径、义旁和声旁功能的探究等方面研究成果丰硕。近年来,包括形声字在内的汉字结构研究呈现了注重断代专题研究的新发展,先秦各时段出土古文字材料的各结构类型专题调查研究均有成果问世¹。立足于这样一个基础,最近的研究已涉及古文字的各结构类型发展演变(刘志基2009),这一研究表明,在先秦时段,“形声”一书完成了它在“四书”中所占比重从最低到最高的转换,形声字在整个字集中的比重从甲骨文的13.89%上升到楚简帛文中的81.84%,而这个百分比已接近“从小篆起”汉字系统同口径数据的“87%”(王宁,2001:96)。由此可知,先秦时段虽然是汉字形声结构发展的初始阶段,但也是其演变幅度最大的时段,聚焦于这一时段形声字的发展状态进行研究,有可能触摸到形声字发展原初动因和规律。这种研究虽已起步,但因限于以整字为对象的观察角度,尽管描述了形声一书在先秦时段总体的数量变化轨迹,却尚未揭示与之相联系的若干底层规律。鉴此,本文将立足于古文字数字化平台,深入到整字的下位,通过对形声字的偏旁²的定量观察分析去谋求这一研究的进展。

一、有关材料与方法的交代说明

由于本文这种特定视角的研究尚乏先例,有必要首先就材料、方法等方面的问题作一点交待。

(一) 关于分析统计的材料对象。

声符义符作为形声字的构件,自然是形声字的构形中分析出来的,由于一个字往往并不只有一个字形,而这些字形又有可能存在结构(是否为形声)的差异,所以作为声符义符的直接分析对象只能是“形声字形”而不能是相对抽象的“字”。也就是说,凡辖有多个形声字形的字,在本文研究中都可能包含了不只一个统计分析单位。然而,字形差异的确认,可以有不同的标准,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我们认同把有差异的字形分为“异写”和“异构”两类(王宁,2001,80~86),因为前者通常不会导致结构的变化,而后者则相反,所以本文所分析统计的对象不应延伸到由“异写”而导致的字形单位,而只应停留在能够造成

¹近年来出版的先秦各断代古文字构形系统研究的系列性专著,均对相关断代文字的形声字作了重点统计整理研究,甲骨文有郑振峰的《甲骨文字构形系统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西周金文有张再兴的《西周金文文字系统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春秋金文有罗卫东的《春秋金文构形系统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楚简帛文有李运富的《楚国简帛文字构形系统研究》(岳麓书社,1997),秦简文有郝茂《秦简文字系统之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战国秦楚以外各方域文字则有赵学清《战国东方五国文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等。

²形声字的偏旁分为声符、义符两类,后文凡言“偏旁”,皆泛指声符和义符。古文字偏旁,多有后世文字所不见者,如“𠂔”,“家”所从;“𠂔”,“宫”所从;“〇”,“袁”“员”所从;“⊙”,“辟”所从;“𠂔”,“皇”所从等。限于篇幅,正文中难以一一交待,读者可查验本文网络附录。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出土战国楚文献语料库的补充与深加工”(项目编号:09JJD740010);上海市重点学科华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项目编号:B403)。

文字结构差异的“异构”这个层次上。

根据这样一种材料对象的界定，既有的某些古文字字形整理成果，因其整理的出发点与本文不尽相同，尚不能简单地拿来为我所用，而需作进一步整理。如就甲骨文而言，虽然《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沈建华、曹锦炎，2001）是本文非常倚重的一种既有成果，但其中所确定的如下这些形声字形¹，因其不具备“异构”的属性，仍需加以归并：

米 0080K 𥝌 0080I 𥝍 0080H 𥝎 0080F / 𥝏 3443B 𥝐 3443A 𥝑 3443C 𥝒 3443D / 𥝓 0894A 𥝔 0894G 𥝕 0894F 𥝖 0894C / 𥝗 2991B 𥝘 2991A 𥝙 2991C / 𥝚 2964G 𥝛 2964E 𥝜 H21248 / 𥝝 2931D 𥝞 2931C 𥝟 2931B / 𥝠 0775A 𥝡 0775B 𥝢 0775C / 𥝣 2594A 𥝤 2594B / 𥝥 0079A 𥝦 0079C 𥝧 0079D / 𥝨 3682F 𥝩 3682E 𥝪 3682G / 𥝫 1127A 𥝬 1127B 𥝭 1127C / 𥝮 0302B 𥝯 0302E 𥝰 0302G / 𥝱 1369A 𥝲 1369B 𥝳 1369C / 𥝴 1415A 𥝵 1416C / 𥝶 3796A 𥝷 3796B 𥝸 3796C / 𥝹 3090B 𥝺 3090C / 𥝻 3224A 𥝼 3224B / 𥝽 2578C 𥝾 2578B / 𥝿 2909B 𥞀 2909A / 𥞁 3090G 𥞂 3090E / 𥞃 1276B 𥞄 1276A / 𥞅 1232A 𥞆 1232B / 𥞇 0524B 𥞈 0524A / 𥞉 2198B 𥞊 2198D / 𥞋 2374B 𥞌 2374A / 𥞍 1231A 𥞎 1231B / 𥞏 2198A 𥞐 2198C / 𥞑 3716B 𥞒 3716A / 𥞓 0345C 𥞔 0345A / 𥞕 1213B 𥞖 1213C / 𥞗 0997B 𥞘 0997C / 𥞙 3589B 𥞚 3589A / 𥞛 3069A 𥞜 3069C / 𥞝 2745C 𥞞 2745D / 𥞟 1637B 𥞠 1637A / 𥞡 2390A 𥞢 2390B / 𥞣 2392A 𥞤 2392B / 𥞥 2593A 𥞦 2593B / 𥞧 2597A 𥞨 2597B / 𥞩 2802A 𥞪 2802B / 𥞫 2805B 𥞬 2805A / 𥞭 3435A 𥞮 3444B / 𥞯 0357A 𥞰 0357B / 𥞱 2745A 𥞲 2745B / 𥞳 3697B 𥞴 3697C / 𥞵 2376B 𥞶 2376A / 𥞷 2716B 𥞸 2716A / 𥞹 2964D 𥞺 2964A / 𥞻 1116B 𥞼 1116A / 𥞽 2919D 𥞾 2919C / 𥞿 3138C 𥟀 3138F / 𥟁 3682B 𥟂 3682A / 𥟃 1896B 𥟄 1896A / 𥟅 2796B 𥟆 2796E / 𥟇 1397C 𥟈 1397B / 𥟉 2093B 𥟊 2093A / 𥟋 H24983 𥟌 H25623 / 𥟍 1486C 𥟎 1486B / 𥟏 1919B 𥟐 1919A / 𥟑 3684A 𥟒 3684B /

其他类型古文字字形处理亦仿此，不再一一说明。

形声字字形作为本文分析统计的对象，又有一个用字文献的范围划定问题。从定量研究的要求来看，尽可能地穷尽材料以避免分析统计对象的遗漏无疑是必要的。而关乎结构分析的材料对象的穷尽又不止一个层次的要求，不重复计算的字形当然是一个需要划定的基本层次，故后文的相关数据凡不加说明者均属以不重复字形为基数的统计；而字形在实际文献中的每一次出现也不是全然无需关注的，根据特定研究目标的要求，有时也会将字频纳入统计分析的范围。然而，在努力贯彻穷尽原则的同时，我们还应承认以下两个事实：首先，作为字形的底层构件，偏旁较之整字在相同的用字数量范围内会有更多的被使用几率；其次，穷尽把握并非简单的无所不包，这不仅仅是因为出土文字材料本质上总免不了被考古发现的偶然所“抽样”，更因为特定的研究目标往往对材料范围会具有某种选择性，不符合这种选择性的材料非但没有意义，而且具有某种干扰作用。因此，材料的穷尽与科学的抽样相结合，才能达到材料处理完备性的目的。关于这一方面的具体处理，将在后文相关处交待，这里不赘。

（二）有关形声字及其偏旁的界定。

由于形声字中存在一些相对特殊的类型，而有些特殊结构类型又与形声字相关，这些相对复杂的文字现象往往会对偏旁的认定造成麻烦，因此要完成偏旁的调查统计，有必要就如何界定偏旁作出交代。综合既有研究的相关意见，形声字中的非常例者大致有省形省声、多形多声，以及亦声等；与形声字相关的则有独体形声字、附画因声指事字、两声字等。从本文研究目标出发，对于这些相关文字现象当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省形”“省声”通常是字形自然结构对造字结构的外在表现形式产生作用力的表现，并不影响形声结构的本质属性。所以这类形声字在本文的分析中被视同一般的形声字，只是要将其被省略的形体复原而已。“亦声”（包括所谓会意兼声和形声兼意）字可以视为兼具会意和形声两种结构者，其会意的一端固然不在本文探究的视野中，而其形声的一面，立足

¹当归并各字形组之间以“/”相分隔，字形后的数字为该字形的《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字号，数字后的字母为《总表》的字形标记。

穷尽性原则，却不宜忽略不计。也就是说，对于“亦声”字，我们亦视同一般形声字来对待。如俞，从“宀”“主”会意，“主”当兼声，在本文分析中，亦视同从“宀”“主”声的形声字。

“多形”“多声”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字现象，裘锡圭先生曾有专门讨论（1996:156~160）。本着客观性原则，对其中所含声符和义符，当然应该作有一个算一个的认定。但正如裘先生所指出的，即使《说文》认定的“多形”“多声”字也多不是真正的“多形”“多声”，从文字构形历时发展的层次性观点来看，有些被认定的“多形”“多声”，其实是将不同发展层次的一形一声误读为同一时间层次中的结构现象（关于这一点，将在后文具体讨论）。因此，对于“多形”“多声”的认定，我们将寻绎汉字构形发展的相关事实进行历时分析，从严加以把握。

“独体形声字”、“附画因声指事字”，根据概念提出者于省吾先生的表述，前者是“具有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而附画因声“这一类型的指事字，虽然也有音符，但和一般形声字都为—形—声两个正式偏旁所配合的迥然不同”（于省吾，1979: 435~446），因此它们分别只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象形字和指事字，并不在我们统计分析的范围内。至于裘锡圭先生提出的“两声字”，黄天树先生认为与假借字“没有本质的差异，只不过假借字用一个声符，两声字用两个声符而已。两声字是在假借字上再叠加一个声符而形成的”。（黄天树，2009）我们认同这种判断，故也不纳入分析统计的范围。

（三）坚持历时分析原则。

由于关注形声字及其声符义符的发展演变，历时分析的方法尤需成为本文研究中贯彻始终的原则。事实上，无论是形声字的确认还是偏旁的确定，都有赖于历时分析原则来保证其准确性，限于篇幅，下文仅例说其若干更为深层的意义。

首先，哪些偏旁的变体在本研究视野中具有意义，有赖于历时分析法来确定。与形声字一样，作为一个特定偏旁，其构形也是可能产生差异的，而这种差异也同样存在“异写”“异构”两种类型，如同一个“其”作声符，既作（所从）、（所从），又可作（所从），、可视为异写，、与则显然就是异构了。很显然，我们一般没有必要像对待形声字那样，将由异构而导致的构形有所差异的偏旁也区别为不同的偏旁单位，这是因为偏旁本身并不是本文统计分析的原材料，它们在结构上是否具备“形声”这个本文统计分析对象的必要身份已经无关紧要。但偏旁的构形差异对本研究而言也并非是全无意义的，如果这种差异与断代属性相关联，则显然在本研究的视野里具有了被关注的意义，如，不见于殷商，而始见于西周。因此，只有将、加以区分作为可以比较的单位，才有助于揭示“其”这一形声字偏旁的发展演变。

其次，在“多形”“多声”“两声”与否的判断中，历时分析的方法又是至关重要的。如“𨔵”（伯疑父簋盖），或释为“从辵𠂔声，牛为追加声符。”（黄德宽，2007: 89）这种解释，有可能让人觉得“𨔵”字有“𠂔”“牛”两声。但从历时角度来分析，“牛”被追加为声符时，“𨔵”便整体演变为义符了，所以“𨔵”只是普通的一形一声字，并非多声。再如，或释曰：“从又，𨔵声，又为叠加声符。”（黄德宽，2007: 562），在这一说解中，“𨔵”“又”似乎都是声符，但作历时分析，既然先有𨔵在前，再叠加声符又，则又为声符，𨔵则转为义符了，所以也并非“两声”字。

（四）古文字考释研究的依据。

本文研究目标所规定的调查，需要涉及海量古文字单字的结构分析，而结构分析是以文字的造字意图的释读为前提的。虽然迄今的古文字考释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依赖这种成绩我们已经可以释读绝大多数的古文字，也正是因为如此，本文的研究才具备了可行性。但毋庸讳言，全面把握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古文字界众多学者集体创造的既有古文字考释研究成果并非易事，原因在于古文字历来多歧释，且考释研究成果又因为种种原因多埋藏于

字代表。也就是说，只选择秦、楚文字作为战国文字发展演变的具体考察对象，不失其典型代表意义。

上世纪末，李运富分析了楚简帛文字构件的类别和功能(李运富, 1999: 53~57)。本世纪初，郝茂则以其专著“绪论”以外的四章中的两章专门讨论“字素(大体类同于基础构件)”的分类和功能(郝茂, 2001)。显然，李、郝两位的研究虽然已涉及秦楚文字的形声字及其偏旁的讨论，但他们的研究结果也并不能直接为本研究所用。就李书而言，由于历史的原因，缺失了上博简、新蔡简乃至郭店简的材料；就郝书而言，则主要是其讨论的秦简“基本字素”和“准字素”并不能与声符义符完全对应，且其基础构件的分类和功能描述缺乏量化的分析。因此，对秦楚两系文字的形声字及声符义符的数量统计，有必要从对一手原始材料的直接整理分析中获得。

1、楚简帛文的形声字及其声符义符

鉴于简帛文已成为战国楚文字的绝对主体，我们将楚简帛文划定为调查统计的对象，具体统计了《战国楚文字数字化处理系统》(升级版)¹，获得如下数据：该系统总用字达 66101 个，排除原简上字形不清及合文，得到 55622 个文献用字，不重复字形有 5650 个，其中形声字 3716 个，从中析得声符 1128：

者 24/ 古句 2 1/ 亡 20/ 易 19/ 它 1 8/ 菁童 1 7/ 高圭 16/ 工各卑 15/ 藿干糞至今尚 1 4/ 豆罍蜀告可董爻方晏晏弋 13/ 皮旨丌毛余父章金 12/ 坐勺甬龍寺之缶毋爻 11/ 旦矛才我于害月丰勺求 10/ 壽谷毛交圭己束辛白膚 9 厶 吞巨 臧萬斤不取虐乍 夔夫瓜齊化昔炎佳與畏石主尊頁申毀弁复加兌則 8 厶 至兆产羊安同 裘虎番宅此分市 菑疋既或元奇 7 / 尚出長未及爲土無雍倉會魚必兼貴曾共妻互盍舅女榮夷川由泉里反置 戈勺 罍奚己生留完 6 / 央帛隼束周氏肖正介是耳雷夫數虛并俞衣莫付辜刃乘舟敢蓼巨辰去公會大辟予 甬朱來虐弔司九多 禾成甫 葉農吾呈已合占攸見 5 骨 柰 翟冒 冏 旃 保 界 术 毆 聖 甚 每 舍 飲 冬 雋 帚 刑 侵 幽 壘 臺 只 兑 昌 中 袁 申 罍 亦 利 豐 屯 豕 果 午 呂 喬 隻 卽 命 庶 勺 若 虞 臯 壬 井 王 开 兒 朋 止 奔 詹 然 並 采 鷹 尤 胃 易 陸 昏 監 卒 五 聶 臣 卢 而 欠 聿 4 / 官 率 巨 賣 寮 米 允 國 萊 卽 難 羅 戶 妾 且 差 因 叟 支 茲 緝 含 角 君 壬 集 季 皇 疆 黃 泉 自 卍 子 尚 啓 吾 量 登 非 夷 隼 凡 戔 良 弟 六 畜 秀 卽 丹 蟲 丁 巽 惠 叁 傘 絲 巧 本 力 喪 辜 亢 尔 樂 業 幺 嶽 文 先 羈 爭 真 別 朕 攷 客 歸 興 云 舄 邪 威 嚮 医 矣 豈 册 复 於 少 豚 尾 卍 升 卍 執 桑 明 色 卍 重 寒 吉 戾 先 單 灸 鬻 船 舍 龔 雀 義 弗 孚 狀 与 兩 區 管 夜 殺 采 聿 衰 聿 条 善 奉 酉 縶 爻 3 / 角 哀 豐 組 汲 幾 向 緝 字 毳 宮 舄 定 佗 曼 單 奮 妥 昆 般 贏 吝 各 殺 刀 昌 晉 發 竹 龍 載 專 鹵 巧 千 曷 厲 俟 彌 寄 壘 睿 鄒 壹 早 八 走 叢 客 壘 口 卒 贅 附 蒙 末 資 允 門 虞 办 担 丑 盧 奠 尻 帝 襄 倫 追 置 耀 白 兇 尸 乃 几 鬼 屮 折 田 召 步 兮 癸 廬 禹 鹿 芒 丙 晒 昏 畢 俊 學 苗 白 黠 旅 口 慙 帝 腹 次 型 庶 牙 壽 呂 厂 棘 交 巾 行 比 立 哉 執 人 离 甸 坳 城 員 內 史 酋 厭 矢 豕 庚 區 頤 上 允 發 妻 卍 音 祈 富 能 丘 敝 衷 撻 舌 卜 價 焚 喬 天 巢 思 世 至 割 秋 屈 腦 耶 墨 熏 皇 異 臣 邑 臣 亞 歎 尹 室 貧 方 奮 孫 岡 犬 輒 再 秦 四 殺 軛 有 尋 气 章 臥 允 奕 昇 旂 2 右 尿 牢 聚 羊 豫 厶 玉 情 遊 猷 史 旱 曰 憲 欲 罍 鼓 采 舄 戊 羽 臣 鬪 戍 遠 原 敏 慮 疒 牽 隴 令 陵 酪 厥 柔 屮 農 學 時 隶 卍 臨 尻 愧 奎 黠 齒 壽 狀 湜 燻 康 侃 割 美 軍 豐 異 旱 晒 矧 障 故 宗 莖 莞 茲 奮 晨 散 支 臣 隕 愁 軫 宰 矢 棗 卍 相 辨 尊 直 地 綽 綽 斬 張 章 敬 綽 羿 果 幻 綽 狀 了 卓 用 稚 幽 螻 宜 一 也 藥 斂 竺 竞 彌 諄 寗 琴 龜 陀 斃 帚 忠 斤 穿 泉 滂 宝 皇 絲 氏 器 泰 恣 山 憲 彡 記 窳 晉 遂 木 命 蔑 室 自 投 受 手 拙 練 視 兒 市 管 棋 身 奢 割 適 泉 枚 蠡 亟 逆 奴 旁 宁 綈 匿 淫 沔 〇 滕 甸 弄 歐 旨 盥 買 馬 麻 皿 冢 旂 棘 粵 片 匹 旆 悉 康 競 侈 苟 紀 无 藥 家 閒 甲 泉 恬 吳 由 救 咎 疾 勞 勒 林 馭 翟 文 祭 降 門 疆 槽 解 覲 芥 肩 將 厥 拳 全 卍 辱 坵 泉 削 容 欲 室 景 戒 幣 台 洒 教 瀛 忘 靜 休 僭 頸 藁 近 日 玆 疥 同 斲 蕙 階 京 齒 蠶 豐 卉 刊 夙 虬 否 緩 惠 淑 百 敗 班 相 交 瘞 嗽 歎 莖 彗 泐 昱 壁 庠 匪 簞 粉 奘 崇 承 帛 回 卍 桀 痲 福 足 弓 隊 左 各 牀 攻 隼 髀 吳 鯀 某 陌 卍 杜 盾 韃 吹 隈 黎 督 德 觀 苾 革 皆 寡 肉 穀 又 二 嘉 卸 羌 士 鼎 同 句 馭 萑 火 昔 三 恣 犀 卍 段 吳 寅 黽 隊 死 品 晉 勿 禾 僕 從 饜 訶 覓 从 阪 馮 式 厚 爾 乎 人 個 帶 固 豕 李 夥 民 肥 兔 菟 車 尼 貨 尸 伎 知 貞 夷 乃 敦 許 天 割 隕 歸 穴 敦 敘 侵 需 訂 戔 縶 系 凶 玄 鏡 牽 兄 叁 月 獻 禽 夙 惕 弔 延 束 陽 憲 雁 顯 昱 新 卍 郤 希 西 太 戊 目 武 廷 巫 印 愚 惟 夕 所 賄 毘 淖 戟 涂 衛 茶 晶 遂 肅 貢 蠶 斲 散 台 戎 宏 惜 觸 黠 產 戕 甘 訶 亥 臭 佛 暴 衡 象 勅 彪 望 桓 恩 良 表 虞 屮 穆 舍 載 迺 友 卍 悲 標 邾 賜 甸 甸 幸 憲 府 恐 允 喜 歆 新 心 辜 孝 卍 斂 蒿 悝 榮 艸 卍 開 雙 巩 豕 腹 廬 罍 匱 僑 次 1 /

¹刘志基等主持开发《战国楚文字数字化处理系统》，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该成果完成了2003年以前楚简帛文献的全文数字化，出版以后，又不断得到材料补充和修订，目前的升级版已包含2009年前公布的楚简文献材料，其中部分内容已挂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网站——文字网上，以供全球使用者检索查询。

三、先秦各断代形声字及声符义符的数量比较研究

下表是对前文统计数据的若干角度的归纳，通过其中相关数据的比较，或能发现先秦时段形声字发展演变的某些规律。

| 文字类型 | 字形数 | 声符数 | 义符数 | 偏旁数占字形数百分比 | 声符占字形数百分比 | 义符占字形数百分比 | 义符占声符百分比 |
|------|------|------|-----|------------|-----------|-----------|----------|
| 甲 | 948 | 430 | 186 | 64.98% | 45.36 | 19.62 | 43.26 |
| 金 | 1922 | 628 | 244 | 45.37% | 32.67 | 12.70 | 38.85 |
| 秦 | 1594 | 760 | 209 | 60.60% | 47.68 | 13.11 | 27.50 |
| 楚 | 3734 | 1182 | 272 | 38.94% | 31.66 | 7.28 | 23.01 |

(一) 字形与偏旁的数量之比。

一定数量的形声字字形，需要多少偏旁作为底层构件来支撑，无疑是与文字构形系统，特别是形声结构系统的发展程度相联系的。理论上说，用较少的构件能组构成较多的字形，这是文字构形系统较为成熟的表现。具体到形声字，较少的偏旁能够支撑较多的形声字字形构造，即意味着形声结构发展程度较高，反之亦然。正如王宁先生所说：“汉字的构形系统形成后，仍然不断进行规整和简化……例如从‘弘’与‘宏’得声的字，已渐渐规整为从‘厶’，从‘宛’与从‘苑’得声的字则规整为直接从‘宛’，这样也可减省一部分声符。汉字构形系统的严密与简化是同时实现的，这是汉字发展的历史趋势中最重要的一点。”（2001:93）上表呈现的相关数据，即偏旁占字形百分比随时段推移一路走低——殷商甲骨文为 64.98%，西周金文为 45.37%，战国楚简为 38.94%，总体上很清晰地证明了此种发展规律在先秦形声字演变中的存在。然而，秦简的同口径数字较高，似乎并不符合上文表述的汉字构形发展趋势，因而需要作进一步的讨论。

偏旁与其所构成字形的数量比例，当然要取决于偏旁和字形两方面的绝对值，因而仅仅关注偏旁一端难免有失偏颇。而字形的数量（即无异构字的唯一字形与含异构字的多个异构字形之和），则与构形系统的规范程度相联系，规范程度越低，一个字的异构便越多，从而造成特定数量偏旁占字形数的比重越低。反之，又会导致恰恰相反的效果。秦简与楚简文字，虽然均可归其时段为战国，但两者构形系统的规范程度却有明显差异，这可以从字频的角度加以描述，规范程度越高，字形数与字数越接近，字形被实际使用的机率越高，字频也就越高。经统计，秦简形声字平均字频 11.57；楚简形声字平均字频 6.85（刘志基:2009），后者的平均字频只占前者的 59%。由此不难发现，在字形与偏旁数量之比的视角中，秦简文字的相关数据因其构形系统的规范程度偏高而失去了有效性。当然，我们又不难从中发现，字形与偏旁数量之比的视角并非是个毫无局限的观察角度，只有与下文给出的其他观察角度相配合，它才能呈现更加全面的信息。

(二) 声符与义符的数量之比。

“最早的形声字不是直接用义符和音符组成，而是通过在假借字上加注意符或在表意字上加音符而产生的。就是在形声字大量出现之后，直接用意符和音符组成形声字……仍然是不多见的。”（裘锡圭, 1996:151）裘先生所说的在既有文字上加注意符（后文称“标类”）和加音符（后文称“标声”），是形声字，特别是早期形声字产生的主要途径，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标类和标声两种形声字产生方式究竟是完全分庭抗礼，还是有主有次？如果有主有次，主次的差异程度又如何？裘先生未作进一步论说，我们也未见到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从理论上说，我们可以通过如下方式的计算来回答这个问题：𠄎之初文作𠄎，故其形声结构成之于标声，凡此共有几何；𠄎之初文作𠄎，故其形声结构成之于标类，凡此共有几何……但回到实际中来，我们会发现选择这条路径并无可行性，原因很简单，由于迄今可

以寓目的古文字材料的局限，许多形声字都不容易找到证明其形成途径的材料。因此，另寻探究途径是必要的。而计算声符与义符单位的数量之比，或许有助于解答这个问题。

标类抑或标声，对声符抑或义符的选择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标类，对义符的选择具有主动性，实际是从构形系统的既有偏旁储存中新选出字义担当者；而其对声符的选择却是被动的，主要表现为它只是对构形单位与语言单位对应的既存事实的一种补充性认定。标声，则恰与标类相反，对声符的选择具有主动性而对义符则是被动的。选择上主动与被动的差异，将直接导致被选择单位的数量多寡的不同。主动选择，“汉字发展的历史趋势中”中的“严密与简化”原则自然会得到积极贯彻，偏旁在构字中的使用频率会得到提升，而偏旁单位的数量则将减少。被动的选择，则使“严密与简化”原则失去了用武之地，消极认定既存存在的结果只能是偏旁单位数量的相对失控。因此，声符与义符单位的数量之比，正可以揭示标类和标声两种形声字产生方式究竟孰主孰次，及主次的差异程度如何的问题。

如果上述逻辑可以成立，则上表的相关数据无疑就标声与标类孰主孰次的疑问给出了相当明确的回答：就各个时段的各种文字类型来看，不但义符的数量均大大少于声符，而且其数量的弱势又历时递增，具体就义符占声符百分比来说，甲骨文为 43.26，殷商西周金文为 38.85，秦简为 27.50，楚简为 23.01。可以认为，这种数据是与先秦形声字的如下发展规律相联系的：在标类和标声这两种形声字发展途径中，前者自始至终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因为这种主导性的存在，文字系统对义符的选择性相对声符而言又呈现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增强的趋势。

第三，偏旁的构字频率之比。

较之不重复计算的偏旁单位的数量，偏旁在构字中参构频率（以下简称“构频”）无疑可以从动态使用的角度显示偏旁系统乃至相关文字结构系统更加真实的状况。因而通过构频来观察先秦形声字的发展，不失为更加深入的探究视角。这种探究首先可以通过平均构频的比较来进行：

| 构频数据 文字类型 | 声符总构频 及声符单位 数 | 声符平均构 频数及其占 总构频数的 比重 | 义符总构频 及义符单位 数 | 义符平均构频 数及其占总构 频数的比重 | 声符平均构 频数占义符 平均构频数 比重 |
|--------------|---------------------|-------------------------------|---------------------|---------------------------|-------------------------------|
| 甲骨文 | 1074/211 | 5.09/0.4739% | 1041/186 | 5.6/0.5379% | 90.89% |
| 西周金文 | 1954/628 | 3.11/0.1592% | 1980/244 | 8.11/0.4096% | 38.35% |
| 秦简文 | 1445/760 | 1.9/0.1315% | 1591/208 | 7.65/0.4808% | 24.84% |
| 楚简文 | 3345/1128 | 2.97/0.0888% | 3606/234 | 15.41/0.4273% | 19.27% |

上表的各种数据是基于前文调查统计的再统计，涉及了各时段形声字偏旁平均构频的各个方面的直观比较，其中最具本质意义的可推最后一栏的“声符平均构频数占义符平均构频数比重”数据。从中不难发现，先秦形声字的发展呈现了声符构频逐渐下降义符构频逐渐上升的趋势，这当然也进一步证明了前文关于标类和标声两种形声字产生方式究竟孰主孰次的问题基本判断。

平均构频之外，高构频偏旁自然也是值得关注的。不同断代的文字系统对于构字中各偏旁成员的选择概率并不相同。以形声发展的“标类”来说，义符作为主动性选择的对象，自然要带上特定断代文字系统的偏好；而声符虽然看上去只是颇为消极的被标类对象，但其被标类资格的获得，实际上却往往是因为此前它已经为文字系统选定，承担了较多记录语言的兼职，因而需要通过标类来明确分工的缘故，故其构频，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文字系统对特定构形成员的选择性趋向。“标声”的情况也大体仿此，不烦赘说。这种选择性差异，当然是最容易在高构频偏旁群的比较中显现的。

就义符而论，四种文字材料中前 5 高频的构形单位共计 13 个：“水女口宀止辵支心糸

邑艸木言”，而其中没有一个是四种文字中共有的，而三种文字中共有的也只有一个“水”，两种文字中共有的只有五个，即“女系宀辵艸”；就声符而论，四种文字材料中前7或前6（秦文字声符构频9以上为6个，而构频8以上则有11个，故只取其前6高频者）高频者共计20个：“𠂇方牵午東弋羊缶易萬𡗗朕𠂇者 古亡句它 𠂇𠂇”，而其中也同样没有一个是四种文字共有者，而三种文字中共有的也只有一个“易”，两种文字中共有的只有五个：“𠂇者古句 𡗗”。最常用的偏旁群之间如此巨大的单位不对应，无疑凸现了不同断代文字形声结构各自具有的鲜明个性。

追究这种个性差异的成因，文字系统历时演变自然是首先可以想到的因素。同义类偏旁的历时更替，最容易说明这一点。比如甲骨文前5高频义符中的“止”，在西周金文和战国楚简中都淡出了前5行列，而后两种文字前5高频义符中，都冒出了甲骨文同频次义符群中所未见的“辵”。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非常明了的，关涉空间移动的义符，甲骨文多用“止”，而西周金文以后则更多用的是“辵”，如“追”“逐”“逆”等字，甲骨文多只从“止”，而到西周金文则多从“辵”，即可为明证。同理，作为多与心理活动相联系的义符，殷商甲骨文多用“口”，战国文字多用“心”或“言”，便造成了“口”在甲骨文能进入前5高频群，而在战国文字同频次义符群中，“口”却被“心”（如楚简）或“心”“言”（如秦简）所替代了。

然而，历时演变的因素或许并不能成为相关偏旁进入前5高频行列的唯一理由。如“女”在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均跻身前5高频义符，而在战国文字中又退出这一群体，原因或许并非“女”在殷商、西周真有那么高的构频，而只是因为甲骨刻辞和西周铜器铭文中需要多用关涉族姓、妇名、女官的用字，而这些字又多从女得义。再如“缶”“萬”之所以能够占据西周金文声符构频之首和第三位，只是因为铭文几乎每器必见“万年永宝”之辞，而以“缶”“萬”为声符的“宝”“邁（读为萬）”字的异构又特别多而已，在“缶”的36个所出字形中，“宝”之异构占据了35个。而在“萬”的21个所出字形中，“邁”的异构占据了19个。由此可见，文献类型的个性，也是导致不同文字偏旁构频差异的一种因素。

参考文献

- 刘志基 2009 字频视角的古文字“四书”分布发展研究，《古汉语研究》第4期，54-63页。
王宁 2001 《汉字构形学讲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沈建华，曹锦炎 2001 《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裘锡圭 1996 《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
于省吾 1989 《甲骨文字释林》，北京：中华书局。
黄天树 2009 论汉字结构之新框架，《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131-136页。
古文字诂林编纂委员会 1999-2004 《古文字诂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黄德宽主编 2007 《古文字谱系疏证》，北京：商务印书馆。
刘志基，董莲池，张再兴，潘玉坤主编 2008 《古文字考释提要总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何琳仪 2003 《战国文字通论（订补）》，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刘志基，张再兴，臧克和 2003 《商周文字数字化处理系统》，南宁：广西金海湾电子音像出版社；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刘志基，张再兴，臧克和 2003 《战国楚文字数字化处理系统》，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李运富 1999 《楚国简帛文字构形系统研究》，长沙：岳麓书社。
郝茂 2001 《秦简文字系统之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刘志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字学研究。

通讯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邮编：200062。

电话：021-62311574。电子邮件：liuzhiji1955@yahoo.com.cn

The Quantitative Survey of Pictophonetic Character in Pre-Qin Days

Liu Zhiji (Center for the studies on sinogram;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quantitative survey of pictophonetic character including bone-inscriptions, bronze inscriptions, Chu and Qin bamboo-inscriptions and their components, by comparing the number of basic characters and the number of character components, we prove that character component of pictophonetic character has a tendency of simplification while developing. By comparing the number of phonetic signs and the number of meaning signs, we disclose that biao lei is always in a dominated position in the two developing paths, biao lei and biao sheng, of pictophonetic character. By comparing the composing ratio of phonetic signs and meaning signs in different types of inscriptions, we prove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inscriptions have different tendency in selecting of character component, and this kind of difference caused not only by diachronic developing of character system, but also by the difference of document types.

Key Words pre-Qin; pictophonetic characters; character component; phonetic sign; meaning sign